

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

分科本◎历史

纪念版

# 多桑蒙古史

上册

〔瑞典〕多桑 著



SINCE 1897

商務印書館  
The Commercial Press

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



纪念版

# 多桑蒙古史

上册

[瑞典] 多桑 著

冯承钧 译



商务印书馆

2017年·北京

#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

## (120 周年纪念版·分科本)

### 出版说明

2017 年 2 月 11 日,商务印书馆迎来 120 岁的生日。120 年前,商务印书馆前贤怀揣文化救国的理想,抱持“昌明教育,开启民智”的使命,立足本土,放眼寰宇,以出版为津梁,沟通中西,为中国、为世界提供最富智慧的思想文化成果。无论世事白云苍狗,潮流左右激荡,甚至战火硝烟弥漫,始终践行学术报国志,不改初心。

迨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,即其一端。早在 20 世纪初年便出版《原富》《天演论》等影响至今的代表性著作,1950 年代后更致力于外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经典的译介,及至 1980 年代,辑为“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”,汇涓为流,蔚为大观。丛书自 1981 年开始出版,历时三十余年,迄今已推出七百种,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、最为重要的学术翻译工程。

丛书所选之书,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,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,皆为文明开启以来,各时代、各国家、各民族的思想与文化精粹,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。丛书系统译介世界学术经典,



引领时代思想,为本土原创学术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文化滋养,为推动中国现代学术和现代化进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。

为纪念商务印书馆成立 120 周年,我们整体推出“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”120 周年纪念版的分科本,延续传统分为橙色、绿色、蓝色、黄色和赭石色五类,对应收录哲学、政治·法律·社会学、经济、历史·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学术经典著作,既利于文化积累,又便于研读查考,同时向长期支持丛书出版的译者、编者和读者致以敬意。

两甲子后的今天,商务印书馆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时间节点上。我们不仅要铭记先辈的身影和足迹,更须让我们的步伐充满新的时代精神。这是商务人代代相传的事业,更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始终紧密相连的事业。我们责无旁贷,必须做好我们这代人的传承与创造,让我们的努力和成果不仅凝聚成民族文化的记忆,还能成为后来人可以接续的事业。唯此,才能不负前贤,无愧来者。

商务印书馆编辑部

2017 年 5 月



# 译序一

一部《元史》，历来囿于“正史”成见的人皆说不好，所以陆续改编了些“续编”、“类编”、“新编”、《译文证补》、《蒙兀儿史记》、《新元史》。这部历史好像是犁然大备，其实不然。修史首重在搜辑史料，而修元史尤须要通晓几种外国语言。不解外国语言，不但不能搜辑外国史料，而且不能解释本国史料。更有进者，外国语言不可偏重一种，像现代有些人认定除英语外无外国语的例子，是不对的。《译文证补》就犯这种毛病。此书虽然引用了许多“西域书目”，好像他是全凭译人口述而“笔受”的，不仅未见波斯语、阿刺伯语种种撰述，而且多桑的书好像也是从霍渥儿特(Howorte)书转录的。洪氏证补《元史》之功固不可没，可是他有一种成见误人不浅。他说西方语言无某音，不及汉字译音之备。此说很不可解。若说用标音字母译写的名称，不及音义有变化的汉字之备，未免很奇。他在《译文证补》里面，根据译人的口述，改了许多《元史》固有的地名、人名。比方《元史》译 Heri 作“也里”，《元朝秘史》作“亦鲁”，皆有译例可寻。可是洪氏根据晚见的 Herat 译作“海拉脱”，似乎只知其一不知有二了。像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。他这种创译，苦了后来续修《元史》的人。所以《新元史》的阿儿浑，在此人本传中作“阿儿浑”，而在《旭烈兀传》同《西域传》中又作“阿儿袞”。



这种毛病皆是不能径读西书所致。

所以我想将多桑这部《蒙古史》翻译出来。此书虽已有一百多年，然而研究蒙古史的人，仍不能不拿来参考。因为《世界侵略者传》、《史集》、瓦撒夫书等书没有完全译本以前，终不能不取材于是书。案：多桑书共有七卷。前三卷述成吉思汗至元亡时的事迹，后四卷专言伊儿汗国的史事，并附带言及钦察、察合台两汗国。其第一卷业经田中萃一郎译为日文，译文尚还忠实，可是有许多人名、地名未取元代载籍的固有译名比对。第二、第三两卷记成吉思汗以后之事，然多取材于中国史书的译文，所本的汉籍，以《续通鉴纲目》、《元史类编》两书为最多，偶亦采用《元史》。然而于《元朝秘史》、《圣武亲征录》等书皆未引用，当然说不上《黑鞑事略》、《蒙鞑备忘录》同元人文集中的许多碑志、行状、家传了。所以我译此书，先从后四卷译起，将来如有余暇，再译比较西方材料较多之第二卷。

多桑书所本之书有二三十种，也有人名、地名不统一的毛病，尤其使人讨厌的，就是他叠床架屋式的译写方法，然而也无可如何，不使用新式译写方法将他改正。霍渥儿特书第四册的索引译写比较简单，可以取来对照。

我原想用白话翻译，不用“史书文体”，可是渐渐不知不觉地受了史书文体的支配，然而我始终力避用“典”。我的目的惟在将此书原意译出，供他人作史料参考之用，所以对于译文只求忠实，不去锻炼字句。在别人看起来，我译的这部书或者比从前的译文退步，然而我觉得译文通畅的地方，容或有点削足适履；文义涩滞的地方，容或确可比对原文；所以宁愿拖泥带水，而不愿钩章棘句。

从前编纂元史的人，除开屠寄以外，皆有译名不一贯之病。所

以我在翻译中,对于人名、地名,颇为审慎。凡人名、地名皆以《元史》、《元秘史》两书为主。两书所有的,选用一名。两书所无的,地名一项,尽先采用唐、宋、明人的译名;人名一项,元代载籍中有同名的,如帖木儿、不花、阿里、忽都不丁、阿合马、亦思马因、阿刺丁、马合谋之类,虽非本人,亦用旧译,元代载籍中无可比附的,则务求合乎元人的译法,不敢以今人的读音认作元人的读音。元人的译法在不明语学的人看起来,好像不对。比方将-l 读作-n 就是一个例子。殊不知这种代替方法,从前也有,而在元代竟成一种通例。所以译 sultan 作算端, Djelal-ud-din 作札阑丁, Iltchikadai 作宴只吉带。这皆是翻译本书所用的正例。然而有时因为下述种种理由,不能不用变例:

元代除开一个最短期间用八思巴字母外,始终用的是畏吾儿字母。畏吾儿字母中无代表 g-、h 的字母,所以蒙古文中多缺此种写法。唐时突厥语的莫贺咄,移植到蒙古语中,应读若 bagatur。可是在蒙文《元秘史》中写作把阿秃儿,则成 ba'atur。在《元史》中更简作拔都鲁,则成 batur。又一方面,阿刺伯字母中不常著录韵母,所以有许多名称写法不一。姑就此把阿秃儿一字而言,本书竟有写作 Behadir 者。我当然不能按着字面翻译,而将它改作八哈都儿。此变例一。

伊斯兰教人的名称,无所谓姓,加之名字相同,要使许多同名的人有别,所以在名后加一别号,如用职务官称之类。再不能判别,则于名后注某人之子,如 Ibn Ali 犹言阿里之子之类。或者还要加上一个地名,如报达人术外因(就是《译文证补》的志费尼)人之类。然而也有无从判别的。所以我将这类的译名,略为变通。



如《元史》中的 Argoun, 是种族名, 是军名, 亦是人名。《元史》为判别这些名称, 将它写作阿儿浑、阿鲁浑、阿里浑、阿刺浑几种写法。我也仿照这个例子, 皆分别著录原文于下。可是也有不能分别的地方。本卷中有三个秃儿罕可敦 (Tourkan Khatoun), 究竟是二人是三人, 无从知之。此种名称只好用一贯的译法。此变例二。

本卷中有些译名, 看起来好像是变例, 其实是正例。比方钦察汗国侵入波斯的统将名唤 Nogai, 《译文证补》将此名译作诺垓。其实此名也是蒙古时代的一个通常名称, 与他同名的人, 在《元史》中颇不少见。我们姑将《元史》的译例来解说。《元史》(我所指的当然是未遭乾隆校刊劫的《元史》) 定宗后名唤斡兀立海迷失, 就是西书的 Ogoul Gaimisch。可见海字对 gai。蒙古人的官号 Noyan, 在《元史》中写作那颜、那演、那衍, 可见那字在元时读若 no。对照起来, Nogai 应该译作那海, 而不应改作诺垓。这类例子很多, 姑举其一, 以概其余。

还有些译名, 可以说是正例, 也可以说是变例。旭烈兀有个儿子, 在此书中(第五卷)写作 Coungcouratai, 《译文证补·阿八哈补传》写作“空库斡台”, 《蒙兀儿史记·世系表》作“空古斡台”, 《新元史·旭烈兀传》作“空古斡儿”。然在《台古塔儿传》又作“康廓而拉台”, 其实皆被多桑叠床架屋的译写方法所误。案: 元代的蒙古人, 常用些部族名称作人名, 仅在后面加上一个接尾词, 大概男名加“台”, 女名加“真”。这些用部族名称而自名的人, 并不是本部族的人, 比方南家台或囊加歹, 并不是中国南方的人, 马扎儿台也不是匈牙利人, 乃蛮台也不是乃蛮人, 不过取其名而已。此处的 Coungcouratai 也是此例。多桑所取的材料来源不同, 写法因之有异。





其第一卷后附注所引《史集》诸部族名，有 Councarat，就是此人名之所本，也就是《元史》所常写着的“弘吉刺”。此名在《辍耕录》中作“瓮吉刺”，在《辽史》、《金史》中作“王纪刺”、“广吉刺”，用新式写法，应作 Qongirat 或 Ongirat。头一字何以有时用声母，有时不用声母，我现在还不能答复这个问题，我们不能拿畏吾儿字母来解释，因为辽、金时代蒙古人还未用畏吾儿字母，可是第二个字的韵母在汉译皆用-i。所以我将这个人名更正为“弘吉刺台”。这个译名初视之好像未遵原文，其实我有我的理由。

本书有若干地名，我明知有误，然而未能确证其误以前，只好随它。比方旭烈兀进攻木剌夷时，有个地名作 Khar。按照霍渥儿特《蒙古史》所引 Quatremère 译本《史集》，此地名是 Khowar，则即是《元史·西北地附录》之“胡瓦耳”。然而我不敢改正，仍然译作哈儿。又如本书中之若干地名，似乎应该“名从主人”，不应用欧洲语言的名称。比方埃及不应名曰埃及，而应名曰密昔儿 (Misr)，美索波塔米亚 (Mésopotamie) 应改作 Diézireh。可是我是译书，而不是在考订，所以也不便改它。然而有时也有点变例。阿刺伯语名阿母河曰 Djihoun。此河元代本有阿梅、阿母、暗木等译，所以我习用旧称，不用新译。本书称阿母河以外的地方曰 Transoxiane，原意犹言“乌浒水外”。译用这个名称，未免太僻。若用康居的名称，未免太古。元时在此地设阿母行省，可是这个行省所管的区域，好像在最初时西及波斯，东兼《元史·西北地附录》之“途鲁吉”(Turki)，不能将这个名称代表两河之间的地域。考此地阿刺伯语之原名作 Mavera un Nehr，此言河中，西辽时于其地置河中府(见《湛然居士集》及《西游记》)。我所以将此地译作河



中,其地既在西域,决不致同蒲州发生混解。

译名一贯之重要,取下面所引的一段《新元史》观之,就可知道了。《新元史》卷二五六(12页)云:“西里亚,埃及属国,以他木古斯为都城。埃及与蒙古隔绝不通使命。宪宗初,西里亚酋纳昔儿商拉哀丁耶思甫取埃及之塔木司古司之地,后为埃及苏而滩哀倍克所败,纳昔儿乃割基纳斯列母克渣及纳蒲列斯海岸以请平。”案:此处的“他木古斯”同“塔木司古司”,明明是一个地方,不知为何用两个译名。此城就是我所翻译的大马司。此城古称同现在英文仍旧袭用的名称,固是 Damascus。然而我只能从原书法文名称之 Damas 而译作大马司。《新元史》的纳昔儿商拉哀丁耶思甫,就是多桑书的 Nassir Salah ud-din Youssouf,我翻译的纳昔儿撒刺丁亦速甫。《新元史》的译法,除开“商”字外,尚可勉强对付。可是后面的“基纳斯列母”,要叫元朝的人读起来,势须作 kinasremou,同多桑书的 Jérusalem 未免相去太远了。况且这是基督教人的圣地,通常译作耶路撒冷者,不知为何发生这样的讹译,大约是翻译的人太无史地常识,而撰修的人未能校对原文所致。由这一方面看起来,可见修元史不仅仅要通晓与《元史》有关系的若干语言,而且还要抛弃中国字古今读音不变的成见。其实我于此道不敢自认高明。我原想等待伯希和所译写的蒙古文《元朝秘史》刊行后,考究元代的读音,再就考究的结果,来整理元代载籍的译名。哪晓得等待了十四年,除开片段的发表外,全书尚未出版。所以于译此书时,不敢自认译音之必是,将所有的人名、地名皆附注原文于下。然不能遍注,只以初见者为限。有时一名两三注者,或因原名有详有略,或因一名写法两歧,或因前后文相距太远,所以一再著录。

读者还要注意的，不仅多桑书所著录的名称不一致，或有误写而必须考订的地方，而且它所本的史料，也不免讹夺。现在姑举一例来说。《史集》记载从大都赴上都的道路有三，第二路经过一城名曰 Djodjou，此城附近别有一城名曰 Simali，后一个名称就是长城附近的洗马林堡。可是 Klaproth、Yule、Blochet 诸人皆说前一地是涿州。在音的方面固然可以将就，在地理方面可就难了。现在从燕京（读者恕我不用这个很不祥的北平名称）到多伦西北八十里之古开平府，何至于假道燕京西南一百几十里的涿州，足证刺失德（Raschid）书传抄有误。伯希和在《亚洲报》（1927 年刊）说是抚州之误，这种考订是不错的。可见不仅读多桑书要审慎，就是读他所本诸书的原文或译文，也要审慎。本卷中所言的狮符，明明是虎符之误。新修元史的人过于重视西方载籍，常将虎符改作狮符。然则《元史·兵志》“佩金虎符符趺为伏虎形”的记载，竟成狗矢了。

本书所引诸书，皆用省称。因为在第一卷卷首已有说明，所以不赘。我的译文既从第四卷起，故将诸书目简单著录于后\*，以明出处。原书可惜无索引，将来如有余暇，容或补加于全书之后云。

1933 年 6 月 1 日冯承钧识

---

\* 该序原是本书下册的译序，后面的译序二原是上册的译序。因随后的第一卷已有该书目的说明，故不再附出。——出版者



## 译 序 二

多桑书共有七卷。我前以为西域三大汗国的史事在旧籍中颇欠缺，在新编中亦多疏误，故先将后四卷迻译。后来看见田中萃一郎所译的前三卷，我又觉得全书仍有翻译之必要（田中的译文我在《大公报》图书副刊第十四期中已有评），遂又将前三卷转为汉文。翻译时间既有先后，前三卷同后四卷的译名不免有若干不能一致的地方。比方 Mohammed 先译作谟罕默德，后在前三卷中概从唐译作摩诃末，就是一个例子。全书译竣，我想将后四卷取回整理，不意原稿清样统已制成纸型，势须大加挖改，末后只好听它，拟在索引中去补救。前三卷有新式标点，后四卷无，也是因为这种关系。

我从前在第四卷序中说过，多桑书同《元史》一样，也有译名不一贯的毛病。因为他所本的伊斯兰教撰述，文字不著韵母，而声母音点有时脱落，常易相混，所以不特相近的韵母有时误用，甚至难于互用的韵母，也能混淆不分。声母之误若无他书可以对勘，竟至无法考订。比方主儿勤之误作 Bourkines，错了一个声母，那牙勤误作 Boucakines，竟错了两个声母，一个韵母。他最使我感困难的，就是对于 c、k、g、kh、gh 等声母毫无分别，例如他译写的 gan，对音可作干(gan)，又可作坚(gān)，且可作罕(ghan, khan)。这种

困难有时还可以用前后文去补救,例如 Togan,不难认识是脱欢。可是他有时又将 o 同 ou 两个韵母互用,写作 Tougan,则未免使人犹豫不决,因为蒙古人也有名唤秃坚的。像这一类的困难不计其数,我自信尚未能完全将它解决。

此外有些译名,好像与对音未合,其实不然。我在第四卷序中曾引证过若干变例,比方将-l 读作-n,畏吾儿字母中无代表 g、gh 等声的字母,就是两个大变例。此外尚有若干为前序所未及的,条列如下:

突厥语发音之 y,在蒙古语中常变作 j。此方突厥语驿站作 yam,蒙古语改作 jam。突厥语法令作 yasaq,蒙古语则改作札撒黑(jasaq)。讹答刺城的守将、杀成吉思汗使者的那个人,刺失德书名亦纳勒出黑(Yinalčuq),号哈亦儿汗(Qayir-khan),而在《元史》则作哈只儿只兰秃(Qajir-Jinaltuq)。除以蒙古语语尾之-tuq 替代突厥语语尾之-čuq 外,两个 y 皆变作 j,一个 l 变作 n。这种例子举不胜举。

蒙古语同西域语常将 b 变作 m,若乞卜察墨(Qibčağ)之变作钦察(Qimcağ),哈卜哈纳思(Qabqanas)之变作憨哈纳思(Qamqanas),是两个很显明的例子。

蒙古语对于发音之 r-,常叠用其后之韵母,比方 Ros 之作斡罗思(Oros),Riazan 之作也烈赞(Äräzan),也是两个很显明的例子。这种译法同古译相反,比方《宋高僧传》卷三有阿你真那(Ratnaci-na),竟将发音的 R-简单删了,大约是汉语同蒙古语无此发音,所以读音或增或减。

发音之 A-有时省略,比方 Abu Saïd 之作不赛因,Abu Bâkr



之作不别，是见于《元史》的变例。可是也有帖木儿的后人 Abu Said 在《明史》中写作卜撒因的。看这个例子，足见收声之-d 偶亦变作-n。但是这种变例的收声不常见。

蒙古语尾之-n 增删无常。若阿勒赤(Alči)亦作按陈(Alčīn)；河西转为合失(Qaši)，也可变作合申(Qašin)；月忽难(Yohunan)又可作月合乃(Yohuna-i)，这个月合乃在《元史》卷一三四误作月乃合，诸本《元史》皆然，可是此人的神道碑实作月合乃，这个名称大概也是从突厥语转贩而来的，在蒙古语中则变作术忽难(Juquanan)。

蒙古语常读 t 作 d，比方将 tarqan 读作答刺罕，将 tair 读作答亦儿，就是两个很显明的例子。这种读法好像不是蒙古语所独有的，从前汉译 tarqan 曾作达干，Turküt 曾作突厥。

上面所说这些变例，不但是译多桑书所应知道的，就是读《元史》也是应该知道的。至若我所用以译写的汉字，我很想适合当时的读音。因为翻译非汉语的人名，固然要求一贯，可也要注意当时的读法。我曾说过，如要整理《元史》译名，必须备具几种条件：一，要名从主人；二，要了解西方北方几种语言；三，要明白汉字的古读，尤要知道元人的读法。从前整理元史的人，好像多未备具这三个条件，所以愈改修愈使人迷离不明。比较以前的整部成绩，只有那珂通世的《成吉思汗实录》微合第二第三条件，可是他常将《元朝秘史》的译音译写近代西文地名：将契丹改作乞坛(Qitan)，还可以说是乞塔惕(Qitat)的单数；将波斯作珀儿昔阿(Persia)，也可勉强对付；可是将埃及作额只魄惕(Egypte)，而不用名从主人之例，作密昔儿(Misr)等类的译法，未免过于刻舟求剑了。但是比较其他



改修的《元史》，总算强多了。现在学界种毒最深的，要首数《元史译文证补》的译名。洪氏丝毫不问上述的三个条件同元代译名的那些变例，对于《元史》名称妄加改窜：比方译 Catchoun 作哈准，而不用元译的合赤温或哈赤温；译 Noqai 作诺垓，而不用《元史》屡见不鲜的那海或那怀。自以为新，其实错了。古人翻译，很明了汉字的读音，比方《圣武亲征录》中由西夏攻至汴梁的蒙古将，译名作三木合拔都，后又作三合拔都，此人的原名是 Samuqa Ba'atur，翻译的人用“三”（古读 sam，今粤人尚作此古读），照顾到第二个字的发声。这种译法就是从前佛经的译法，也就是《元朝秘史》的译法，不像今人随使用本人乡土的方言，同似识非识的汉字，译写外国语言名词之乱。所以《元史》中的译名虽不统一，除开过于省译之名称外，皆不难复其原名。至若《元史译文证补》一直到《新元史》的译名，能够还原的恐怕很少。

我所用的标准译字，多从《元朝秘史》，然而并不认定《元朝秘史》是一部完全不误的译文，其中也有些传写的错误。比方将你沙不儿(Nišabur)写作亦薛不儿(Isäbur)，将亦刺合(Ilqa, Ilaqa)写作你勒合(Nilqa)，可以说是音点不明，致有此误。可是杀乃蛮王子古出鲁克(屈出律)的地方作撒里黑昆(Sariq-qun)，证以近来发现的蒙文《秘史》残本，实是撒里黑豁勒(Sariq-ğol)之误。如此改正方与蒲犁县之土名相合。这类版本的错误，《秘史》中尚有不少，所以我虽采用此书，可不绝对盲从。

旧译名除开过于省译的名称，像忽亦勒答儿(Quïldar)《元史》作畏答儿的例子外，我皆尽量采用，决不自出心裁，妄易新翻。元代载籍所无之人名、地名，而有旧译者，则用元代前后之古翻，如



隋、唐之范延，《明史》之帖必力思之类，亦不别用新名，不用今读之字译古名，也不用古读之字译今名。凡原名初见者，皆附西文原名于下。可是对于多桑书所采乾隆时妄改的名称，根本既有错误，西文译写之名除不误者外，概从删弃。好在多桑书的精华全在伊斯兰教著作，他所转贩的那些汉籍副料（以《续通鉴纲目》为最多），应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整理。

多桑书所引刺失德书很多，而刺失德书同《圣武亲征录》并出一源。在刺失德书未直接转为汉语以前，我觉得多桑书是一部很好的参考史料。比方《亲征录》所载木华黎率王孤、火朱勒、忙兀、弘吉刺、亦乞刺五部以及契丹、女真之兵南侵中国一文，其中的火朱勒部，久之未详其对音为何，今观多桑书，知为 Qošiqlol。然则《亲征录》原译或是火失火勒矣。刺失德书（Berezin 本数见此名）说是每十人队中挑选二人组织成的军队，此说颇类真相，因为此字的字根是 qos，突厥语犹言双也。此姑就以多桑书校正中国史录而言。反一方面说，也可取中国史料校正多桑书。兹举一例为证：多桑书第一卷第二章有个部落，名称曰亦勒秃儿斤（Ilturkine），后在附录中亚部族表中，又作亦勒都儿斤（Ildurkine），检《元朝秘史》卷六相对之文（叶本 31 页），王罕有个使臣名亦都儿坚（Idurgän），后（49 页）同一人又作亦秃儿坚（Iturgän），也是一名两种写法，姑不问究竟是人名抑是部名，要可以《元朝秘史》的名称改正多桑书之误。

我译多桑书时，很想作一种互证的工作，所以在第一卷第二章中用力很勤，可是费时也很久。如此做下去，恐怕几年也译不完，后来只好译而少证。





我在本序中所用的译写方法，除引用多桑原文外，皆用新法。因为多桑书之叠床架屋的译写方法太累赘，并可发生误会。比方谷儿只王 Lascha，《蒙兀儿史记·西域传》误读作辣思伽，其实应作刺沙（承袭此人王位的鲁速丹，就是刺沙之妹，然而新修的《元史》迄未认清是何人，《蒙兀儿史记》误作刺沙之甥女，《新元史》误作刺沙之弟妇。大约是习于中国观念，以为只有弟媳妇摄政，哪有姑奶奶当权？是不特不明西史，而且并 Howorth《蒙古史》的世系表亦未寓目）。若是用新法写作 Laša，就不至于发生这类的误读了。我译多桑书常想将他的译名修改。可是他的写法无一定标准，有许多名称很难判别，末了只好听他，仅在汉译名中略为变通。所以 dji 常译作“赤”，而不作“只”。再者多桑的译名皆作“法语化”，比方蔑儿乞惕已经是蒙古语表示多数的名称了，应该写作 Merkit，可是他写作 Merkites，另外又添了一个法语多数，弄成画蛇添足。要是遇见一个翻译匠一字一音地当作英文读去，恐怕最博识的考据家也无从考见真相了。这也是读多桑书应该注意的一点。蒙古语表示多数的语尾固然是-t，《元秘史》写作“惕”，可是因为采用别的语言，或因他种原因，有时多数作 s、r、l，《元秘史》写作“思”、“儿”、“勒”。比方南家思(Nankiyas)、速勒都思(Suldus)、巴鲁刺思(Barulas)，用“思”而不用“惕”，札刺亦儿(Jalaïr)、塔塔儿(Tatar)，用“儿”而不加“惕”，撒儿塔兀勒(Sarta'ul 就是回回)，用“勒”而不改“惕”，皆可为证。我还疑心有用-n 字作多数的。晃豁坛(Qongotan)的多数固作晃豁塔惕(Qongotat)，乞颜(Qiyan)的多数固作乞牙惕(Qiyat)，为甚么乃蛮(Naiman)不作乃马惕(Naimat)呢？元代固有乃马台(Naimatai)、乃马真(Naimajin)的

